

比较

2016年
第1辑
总第82辑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编

安德鲁·霍尔丹

经济增长的快与慢

菲利普·阿吉翁等

产业政策和竞争

詹姆斯·罗宾逊

产业政策和发展

丹尼·罗德里克

过早去工业化

J. H. 韦尔克尔克

就业保护法的经济学分析

许成钢

评科尔奈的《动态变化、竞争和剩余经济》

斯特凡·施莱歇 安德烈·马尔库等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结构改革

余晖 何静

澳大利亚的医疗卫生体制



比较

总第82辑

2016年第1辑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第 82 辑 / 吴敬琏主编.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2

ISBN 978-7-5086-5881-0

I. 比… II. 吴… III. ①比较经济学 IV. ① F0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2629 号

比较·第八十二辑

主 编: 吴敬琏

策 划 者: 《比较》编辑室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财新传媒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5881-0/F · 359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96-0110

<http://www.caixin.com>

010-58103380

E-mail: service@caixin.com

卷首语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和“四降一升”的严峻挑战。面对这些挑战，必须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推动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从供给侧来说，有三个因素，即投资、劳动、效率。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新增劳动力正在减少；多年以来由于加大投资已经带来一系列问题，不能继续；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往往归因于效率太低。由此，主编吴敬琏教授早在几年前就一直强调，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要转轨，要找到新的动力，只能依靠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增加投资转向增加索洛余值，也就是要创新，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也即提高供给的效率。本辑《比较》以此为主题，为读者们提供了若干文章。

安德鲁·霍尔丹的文章“经济增长：快与慢”探讨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和增长源泉。他把考察全球经济增长的时点追溯至公元前1000年，用各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指标来分析三千多年来的增长态势。这些分析表明，人类社会长期缺乏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处于停滞状态，直至工业革命才走出停滞，步入历时两百多年的创新和增长通道。他着重从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视角，综合剖析了工业革命得以产生的技术和社会根源。在霍尔丹看来，在促进增长方面，社会因素的变化，如社会中的合作和信任、制度和基础设施、政府角色、耐心等，支持了技术变革或领先于技术变革，因此，社会因素的变化至少发挥了和技术变革同样重要的作用。对于未来的经济增长，他认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同时阻碍经济增长的社会因素也不容忽视，在这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未来的增长将

徘徊在平凡与神奇之间。”

2015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产业政策要准”作为推进结构性改革的五大政策支柱之一。我们特意选取了两篇论述产业政策的文章，也许可以为实施“准”的产业政策提供启发。新经济增长理论的领军人物菲利普·阿吉翁等人的文章“产业政策和竞争”以中国为背景，讨论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可以提高生产率，进而推动增长。作者们使用 1998—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从实证角度研究补贴、税收减免、（低息）贷款和关税等产业政策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竞争性部门实施的产业政策（补贴或税收减免）、旨在维持或者促进竞争的产业政策（比如引导企业进入或者鼓励新企业发展），对生产率增长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初始竞争更为激烈的部门实施补贴和免税这样的产业政策，能够改善企业的表现，而实施（低息）贷款和关税补这样的产业政策，则不能改善企业的表现。作者们还指出，为了使产业内的利益集团对产业政策施加的影响最小化，应以更分散、更有利于竞争的方式实施扶持型产业政策。詹姆斯·罗宾逊的文章，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国际上，产业政策不乏成功和失败的案例。这些案例一方面说明产业政策可以是社会所需要的，并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另一方面，与任何对社会有益的政策一样，产业政策也受制于具体社会的政治均衡特征，比如哪些利益团体能被动员，关系到怎样的利益，处于怎样的政治体制环境中。在这些政治因素的影响下，即使能推出产业政策，也未必会采取理想的形式。因此，仅仅提出好的产业政策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考虑这些好建议如何能被掌握政治权力的群体自愿采纳。

在一国经济实现增长、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工业化是最重要的推动力。然而，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却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在“过早去工业化”一文中，罗德里克利用三个工业化测量指标——制造业就业占比、按当前价格计算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详细描述了不同类别的国家之间的去工业化格局，并根据这些指标和收入之间的关系，界定了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过早去工业化现象。他进一步阐释了发展中国家去工业化现象的成因，其中全球化是一个重要因素。罗德里克认为，过早去工业化对发展中国家并非好事，它踢走了经济借以快速上升的“梯子”，还可能产生不利的政治后果。对尚处于向高收入国家转型的中国经济来说，工业化仍然至关重要，罗德里克的分析值得我们加以重视。

“法和经济学”栏目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法学教授韦尔克尔克的文章“就业保护法的经济学分析”。这是一篇综述性文章，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文献，包括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研究就业保护法如何

影响劳动力市场，用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就业保护法的改革对经济产出和经济行为的影响，以美国各州就业保护法的不同变化来研究就业保护法对劳动力流动、就业、雇员人力资本投资等方面的影响，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就业保护法的渊源和政治动力机制。这些研究为全面认识就业保护法的影响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新书架”栏目是许成钢为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教授的新书《动态变化、竞争和剩余经济》而作的书评。这篇书评从一般均衡和方法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动态变化的政治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列宁式国家资本主义等方面，分析并归纳了科尔奈著作的主要观点和软预算约束这样的重要概念。许成钢认为，科尔奈著作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阐释了资本主义的特点。

斯特凡·施莱歇和安德烈·马尔库等人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结构改革”一文分析了欧盟现行排放交易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该体系的三个一揽子改革方案，并评估了这三个改革方案的可行性。作者们还简要介绍了韩国、美国、中国等国家的排放交易体系，比较了它们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不同特点。

比较之窗栏目是余晖等人的“澳大利亚医疗卫生体制研究”一文。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澳大利亚的国民医疗照顾制度、卫生服供给方的制度安排、卫生体系的行政管理体制、卫生资金的筹措和支付制度，并对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出了建议。

目 录

Contents

第八十二辑

- 1 经济增长：快与慢 安德鲁·霍尔丹
Growing, Fast and Slow *by Andrew G. Haldane*

产业政策专题 On Industrial Policy

- 30 产业政策和竞争 菲利普·阿吉翁等
Industri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
*by Philippe Aghion, Jing Cai, Mathias Dewatripont, Luosha Du,
Ann Harrison, and Patrick Legros*

61 产业政策和发展：政治经济学视角

詹姆斯·罗宾逊

Industr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by James A. Robinson

特稿

Special Feature

80 过早去工业化

丹尼·罗德里克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by Dani Rodrik

法和经济学

Law and Economics

116 就业保护法的经济学分析

J. H. 韦尔克尔克

Discharge

by J. H. Verkerke

新书架

New Books

144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评科尔奈的《动态变化、竞争和剩余经济》

许成钢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Review of Kornai's *Dynamism, Rivalry,*

and the Surplus Economy

by Chenggang Xu

166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结构性改革

斯特凡·施莱歇 安德烈·马尔库等

Scanning the Options for a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EU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by Stefan Schleicher, Andrei Marcu, Angela Köppl, Jürgen Schneider,

Milan Elkerbout, Andreas Türk and Alexander Zeitlberger

216 澳大利亚医疗卫生体制研究

余晖 何静

The Health System in Australia

by Hui Yu and Jing He

经济增长

快与慢

安德鲁·霍尔丹

本文的主题是经济增长。听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常规话题。在媒体上，经济学家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增长及其统计指标 GDP。然而，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不应过度关注 GDP。例如，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充分认识到，GDP 只是对社会福利水平的部分测量，且往往并不完善。^①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并非所有可计量的都是重要的。

尽管如此，持续的经济增长仍然是提高社会生活水平的唯一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以中国和意大利两国经济为例，1990 年两国国民总收入大致相同。^② 此后中国年均增长率超过 10%，而意大利不足 1%。20 多年后的 2014 年情形如何？按照复利的计算方法，2014 年中国国民总收入为意大利的 8 倍。中国每 18 个月就会创造出一个与意大利规模相当的经济体量，每个季度创造的经济规模与葡萄牙相当，每个月创造出一个与希腊规模相当的经济体量，每周创造的经济规模相当于塞浦路斯的经济规模。这些可以计量的指标有时确实很重要。

* 本文为英格兰银行执行董事兼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霍尔丹（Andrew G. Haldane）2015 年 2 月 17 日在英国诺维奇东安格利亚大学发表的演讲。英格兰银行不负责翻译的准确性。

① Stiglitz、Sen and Fitoussi (2009)。

② 以目前的购买力平价汇率计量的总量。

当前的政策辩论也表明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增长一直表现不佳。危机前的10年间,发达国家年均增长3%。危机发生以来,增长率降至1%。世界增长由快转慢,人们开始担心“长期停滞”即将到来,所谓长期停滞是指经济增长将长期低于正常水平。^①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有过同样的担忧。^②

近年来的低速增长究竟是危机之后的短暂现象还是经济趋势中的长期低谷,尚无法确定。悲观论者对过度负债、财富差距扩大、人口老龄化加剧和教育停滞等问题心存忧虑。^③乐观派则欣喜于数字技术领域的新一轮产业革命。^④鉴于经济增长对生活水平的重要影响,两派观点之间的交锋是当代的关键问题之一。

为深入理解这一交锋,我们不妨从长期视角考察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济增长经历了不同阶段的交替,既有长期停滞的时期,也有不断创新的时期。理解不同增长阶段的社会和技术决定因素,有助于探明当前可能导致长期停滞或不断创新的具体因素。^⑤

下文从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视角进行综合讨论。如果一定要找出这些视角的公分母,那就是我们两耳之间的大脑。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指出,大脑的思考方式有快与慢两种。^⑥当我们理解经济增长的时候,或许也是如此,而且出于许多同样的原因。

经济增长的短期历史

图1展示了1750年工业革命以来人均GDP对数的变化趋势。如果不考虑战争影响,过去250年来人均GDP呈直线上升趋势,增长率约为年均1.5%。这意味着每一代人的生活水平都会比上一代提高1/3。经济增长持续提升生活水平。

① Summers (2014), Vox-EU (2014).

② Hansen (1938).

③ 也可参见 Gordon (2012, 2014), Summers (2014), Cowan (2014).

④ 也可参见 Brynjolfsson and McAfee (2014), Mokyr (2014), Arthur (2011).

⑤ 有些研究侧重于从需求不足的角度讨论长期停滞[例如, Summers (2014)]。本文重点关注供给方面的结构性因素。从萨伊定律的角度来看,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或者供给不创造自己的需求,中期内两者区别并没有那么大。

⑥ Kahneman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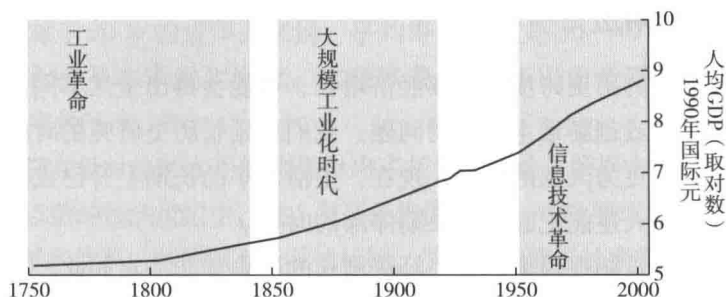


图1 1750年以来的人均GDP

资料来源：DeLong (1998)

虽然增长较为平稳，但并非恒定不变。历史上间或发生的战争、经济萧条和金融危机会造成经济停滞甚至下滑。阶段性的技术创新又使经济前景好转，显著提升生活水平。然而，经济衰退只是暂时的，经济大踏步前进是持久性的。在过去的两个半世纪中，与持续创新相比，长期停滞几乎微不足道。

为解释1750年以来生活水平的提升，经济学家通常将这段历史分成三个创新阶段。每个阶段都伴随着社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向外大幅扩张。^① 第一阶段是从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第二阶段是起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大规模工业化时代；第三阶段是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

这三个创新阶段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都产生了一系列通用技术（GPTs）。^② 这些技术的应用领域远远超出了最初设计这些技术时所用的行业，从而普遍提升了商业运行的效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通用技术包括蒸汽机、纺织机和铁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通用技术包括电力、内燃机、自来水供应和卫生条件改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通用技术包括个人电脑和互联网。

近几年增长前景逐渐黯淡，又一次强化了人们对创新主导型增长的关注，创新是否会萎缩成为长期停滞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一些人认为创新之源或已枯竭；^③ 而另一些人却认为数字技术的创新之泉正在喷涌。^④ 长期停滞与持续创新究竟谁将占主导地位呢？

① Gordon (2012).

② Bresnahan and Trajtenberg (1996).

③ Gordon (2012, 2014), Cowen (2011).

④ Brynjolfsson and McAfee (2014).

经济增长的长期历史

如果在较长的历史跨度内观察经济增长,可能会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因此,为回答停滞或创新谁主沉浮的问题,我们应延长历史研究的时间尺度,回到工业革命之前更为久远的历史。现在,生活水平的长期上升已成为社会经济的常态,几乎没人还能记起经济长期停滞的时期。

然而,通过长期视角来观察,经济增长的历史并非一直如此。图2展示了公元前1000年以来的全球人均GDP的变化轨迹,这段更久远的增长史与工业革命以后有天壤之别。工业革命之前的3000年间,全球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仅0.01%,生活水平长期保持不变。按照1750年以前的增长率,生活水平翻一番需要6000年;而1750年以后,生活水平翻一番仅需5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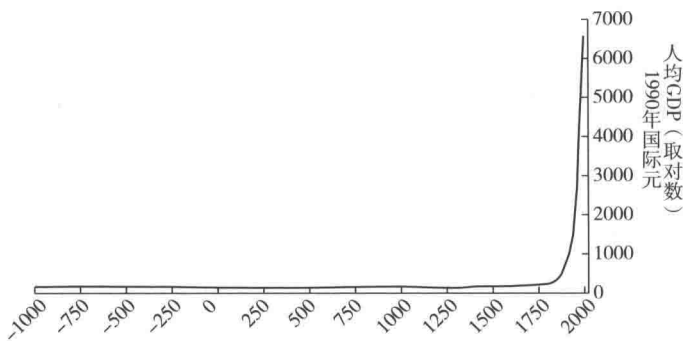


图2 公元前1000年以来的人均GDP

资料来源: DeLong (1998)

这表明工业革命以前社会和经济的常态并非长期增长。在前后两代人之间福利水平没有觉察到改善,永久性地缺乏经济加速器。生活水平稳定持久的上升并非常态,而更像是近代才出现的例外。在长期历史视野中,长期停滞远比连续创新更为寻常。

当然,因覆盖面过窄,GDP无法全面衡量更久远的历史中社会生活水平的改善。非物质指标或许可以更好地衡量生活水平。如果采用其他指标,是否有理由相信1800年的公民平均福利与公元1000年前后区别不大?

正如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的优秀著作阐明的那样,^① 社会

^① Clark (2009).

学证据显示两者并没有区别。1800 年以前的几千年间，平均预期寿命基本未发生变化。对于 20 岁的成年人来说，平均寿命也就是 30—40 岁。^① 该时期的出生率与死亡率基本未发生变化。这意味着 1750 年以前全球人口几乎不变，人口年增长率低于 0.1%。

对于人们在世时福利水平的测量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依据古代骨骼记录的测算，1800 年以前的很多世纪中，成人身高平均值在 160—170 厘米之间（图 3）。热量摄入量也基本持平。利用以上及其他指标，学者们构建了社会发展指数，^② 该指数与 GDP 变迁轨迹很相似，都表明很长时期内人民生活水平未发生变化（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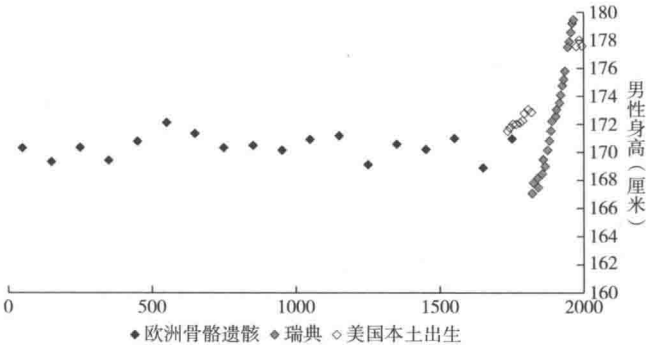


图 3 公元 1—2000 年从欧洲骨骼记录测算的男性身高

资料来源：Clark (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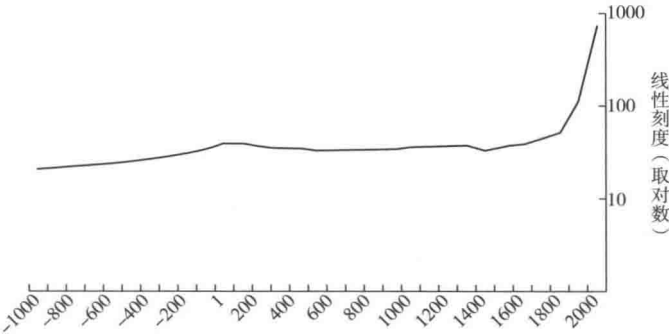


图 4 社会发展指数

注：本图显示的是 Morris (2010, 2011) 给出的“西方”与“东方”社会发展指数的平均值。社会发展指数的构成包括能源捕获、组织、作战能力和信息技术。

资料来源：Morris (2010, 2011)

① 也可参见 Clark (2009)。

② 也可参见 Morris (2011)。

这些福利衡量指标表明，在过去 3000 年的大多数时间中，全球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停滞不前，仅在最近 300 年出现了飙升。工业革命以前，收入基本锁定在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与马尔萨斯的预言一致，这些收入仅够维持人口数量，不足以支撑人口的大规模扩张。^① 因此有些人将工业革命以前的时期称为“马尔萨斯时代”。^②

尽管这看起来很残酷，但如果追溯到更早以前，情况更不乐观。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已能估计出公元前 100 万年——人类的黎明——以来全球的 GDP 估计值。^③ 从事估算的统计机构的工作人员比较少，因此需非常小心地对待这些统计数据。

表 1 是公元前 100 万年以来人均 GDP 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生活水平实际上都没有提高或增长。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可能开始于数万年前，大约发生在现代人（智人）出现和穴居人（尼安德特人）消失时期。

表 1 公元前 100 万年以来人口及人均 GDP 的增长

年份	人均 GDP 年变化（%）	人口年变化（%）
公元前 100 万—前 10000 年	0.000	0.000
公元前 10000—前 1000 年	0.003	0.028
公元前 1000 年—公元 1 年	-0.015	0.122
1—1000 年	0.020	0.044
1000—1500 年	0.007	0.095
1500—1750 年	0.102	0.211
1750—2000 年	1.452	0.870

资料来源：DeLong（1998）；Kremer（1993）

所以，经济增长的短期历史（黄金时代）和长期历史（马尔萨斯时代）之间可谓天差地别。在经历了漫长的长期停滞之后，人类才步入持续创新的轨道。生活水平的明显上升只是最近才发生的事。如果将经济增长历史比作一个

① Malthus（1798）。
② 也可参见 Clark（2009）。
③ DeLong（1998）。

24 小时刻度的时钟，那么，99% 的增长发生在最后 20 秒。

工业革命的技术根源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近 250 年来经济增长的变化？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模式远非易事。甚至到现在，经济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们还在激烈辩论增长的深层原因。本文无意于是非判断，而是提供基于相关文献的反思。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将这些文献联系起来——耐心。

新古典经济学解释了为什么耐心对经济增长很重要。它支持储蓄，因为储蓄会转化为投资，进而形成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和资本运用效率的大幅提升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所描述的增长动力。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增长。^①

在新古典模型中增长是外生的，即由外部因素决定。主要有两个外部力量：一是个人的耐心，耐心既不随时间推移也不随地域而改变；二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以不可预测的方式随时间变化。创新就像是来自上帝的恩赐，不断从天堂收到的令人惊喜的礼物。

看起来，这个简单的故事很好地解释了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的阶段变化。18 世纪下半叶，在英国集中出现了一系列密集的创新：1764 年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1769 年阿克赖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1775 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这些发明像上帝的恩赐一样突然到来，并且正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预言的那样，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移动。

通用技术从产生到应用范围和影响的扩大，一般需要数十年的时间。^② 因此经济增长率和生产率到了 19 世纪才开始上升。此时，出现了一波以工厂、机器和机车为主的实物投资。随着投资的快速增加和技术转变的结合，人类历史迎来了生活水平持续提升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表 2 是工业革命前后技术效率增长的估计值，有力地支持了新古典理论对增长动力的解释。^③ 工业革命以前，每年技术进步远低于 1%，几乎难以察觉到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和生活水平的提高。1750 年以后，技术之门已经打开，技术效率年均增长率达到 1% 左右。

① 也可参见索洛—斯旺模型 (Solow, 1956; Swann, 1956) 和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 (Ramsey, 1929; Cass, 1965; Koopmans, 1965)。

② 也可参见 Eichengreen (2014)。

③ 引自 Clark (2009) 1750 年以前的估计值和世界银行对之后时期的估计值。

表 2 公元以来的技术增长

年份	技术增长率的年均变化
1—1000 年	0. 001
1000—1500 年	0. 025
1500—1750 年	0. 045
1750 年至今 ^(a)	1. 034

注：Clark (2009) 估计了 1750 年以前的技术增长，假设人口稳定在人均土地产出仅能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上。(a) 技术增长率以希尔等人 (Hills、Thomas and Dimsdale, 2010) 的英国 1850—2009 年的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计算。

资料来源：Clark (2009)；Hills、Thomas and Dimsdale (2010)

技术进步又会促进实物资本的积累。图 5 描绘了英国 1850 年以来人均实物资本存量的变化趋势。人均实物资本存量年均增长 1. 75%。该图也反映出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均 GDP 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850 年以来，人均资本存量每增加 1000 英镑，人均 GDP 将上升 400 英镑。这也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预测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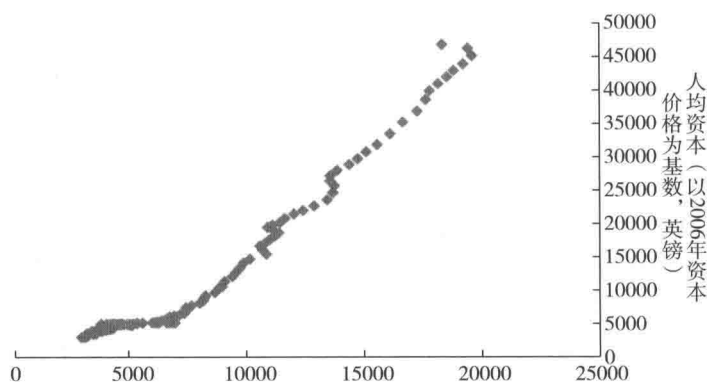


图 5 1850 年以来英国的资本积累

资料来源：Hills、Thomas and Dimsdale (2010)

其他国家的增长模式与英国大体相同。图 6 是 1980 年以来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均 GDP 关系的跨国数据截面图。显而易见，各国处于增长的不同阶段。但就每个国家而言，增长都保持向上态势，资本存量的持续增加伴随着人均收入的长期提升。昨天的投资已成为今天的增长。